

## 第一章 “百年老店”换门面

### ——中国国民党内部权力重组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见 199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台湾《自立晚报》）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竟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 1988 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也就不难理解了。

#### 一、蒋经国去世 李登辉上台

1988 年 1 月 13 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主席兼“总统”蒋经国突然去世。不到 5 个小时，“副总统”李登辉登上“总统”宝座。13 天后，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

会”）上又出任中国国民党代理主席。

李登辉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进入政界有着很大的偶然性，早期的他也没有为能够在政治上发展，进行过过多的精神和物质投资；在进入政界后突飞猛进，12年后成为蒋经国的副手，15年后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这一收获则是蒋经国提拔和李登辉自己修炼的结果。

李登辉表面木讷，含威不露，却深藏玄机，韬略齐全。他靠权术，利用“政治强人”蒋经国去世后出现的政治空白和国民党上层集团对此出现的迷茫，终于建立起个人统治基础，贯彻个人意志，形成以搞“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走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迷途。中国国民党开始全面蜕变。

## 李登辉的学术生涯和从政活动

李登辉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在福建永定地区，有一个古老的风俗，一个村合筑一个环形建筑，由三四层的楼房围成一圈，中间的广场为村民的活动区，世代相传。这一世界上罕见的建筑奇迹，富有特色，李登辉的祖先曾在此生活过。

清代中叶，李登辉的祖先移民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

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出生19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主要靠其父留下的近百亩土地务农为生，曾短期当过日本刑警，家境在当地属中上等，正如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所说，他家是个小康之家。1958年至1963年间，两次当选“台北县议员”。李金龙1995年4月19日病故。

李登辉的弟弟李丙楠经营一家从事杂货进出口的贸易公司。李登辉的兄长李登钦，1921年2月19日出生。1938年中学毕业

后，在淡水警察所当警察。1943年日本殖民当局实施“台湾特别志愿兵令”，扩大征用台湾青年入伍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李登钦“毅然报考海军特别志愿兵”，11月进入“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第一期”受训，1944年4月编入“左营海兵团（即海军陆战队）”，成为海军二等机关兵。在军队里，他将名字改为岩里武则。同年7月，离开高雄港前往菲律宾参战。1945年2月15日美国军队反攻吕宋岛时，岩里武则在军舰上被击毙，并随舰一起沉入大海。李登钦死后被“追赠”为“第31特别部队海军上等机关兵”。在太平洋战争中，像李登钦那样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台湾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他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说，他有幸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才能够完成学业。1940年春，18岁的李登辉在读了4年中学后，提前一年考入台北高等学校（今台湾师范大学）。日本占领时期，在接受教育上台籍人被歧视，班上只有5名中国台湾人，李登辉就是其中之一，所使用的日本名字为“岩里政男”。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大学学习，专业为农业经济。在日本留学期间，也参加预备役，担任炮兵上尉。从李登辉的学历看，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就读，后是在日本学校学习，接受的基本是日本教育。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承认，“22岁以前是日本人”，这对他后来世界观和性格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一是接受了当时军国主义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思想被长时间灌输和熏染，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学会了日本人的忍耐，位居低下时忍气吞声，出人头地时趾高气扬。

日本投降后，李登辉回到台湾大学农经系继续学习，在校期间担任农学院代表（学生）会主席。1949年秋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与曾文惠小姐结婚。

尽管在1999年12月中下旬，台湾岛内出现了关于李登辉青年、老年不同阶段婚外情传闻，但李登辉和曾文惠之间还是和睦相处的，他的博士论文上还印有“To My Wife”。李登辉第一次“台独”心声大暴露、与司马辽太郎谈话的主题“台湾人的悲哀”，就是曾文惠建议的。并且夫妇两人大谈《出埃及记》，暗喻李登辉是“台湾人的摩西”，要建立“台湾人的国家”。李登辉的儿子李宪文，1984年在台湾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班”学习时因癌症去世。李宪文的夫人张月云、女儿巧巧和李登辉的小女儿李安妮、小女婿赖国洲与李登辉住在一起。李安妮和赖国洲两人经常抛头露面。赖国洲作为“新闻评议会秘书长”，在新闻、电视、广播界身兼多项职务，为老泰山的重要智囊，经常在对外关系和两岸关系方面进言，是“两个中国”和“务实外交”的主要倡导者。在1996年12月23日召开的国家发展会议（简称“国发会”）上，赖国洲竟然提出了两岸关系为“准国际关系”的谬论。李安妮曾在1996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前后，公开攻击另一候选人林洋港的“行政领导能力”只及其父的“七分之一”。李登辉的长女李安娜，任教于东海大学会计系，1980年3月与外科医师黄循武结婚。黄循武在台中荣总分院任职，1994年起自行开业。夫妇两人基本不涉及政治。

李登辉于1951年去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进修1年，回台后继续在台湾大学任教，并在当年他的老师、原台湾大学农经系教授、时任“省农林厅长”徐庆钟（后在李登辉出任“政务委员”时，升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邀请下，出任“农林厅经济分析

股长”。1957年起出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稍后担任“农业复兴委员会（以下简称‘农复会’）技正”。同时，也由台湾大学评为“教授”。

1965年，42岁的李登辉考中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乃尔大学联合奖学金，赴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8年7月13日，他所写的长达400页的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与农工间资本移动问题》被导师认可。次年8月20日，美国农业经济协会宣布，此文获得美国年度最佳博士论文优秀奖。康乃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史丹登在致李登辉的信中称，李在康乃尔大学的学习中，不仅增进了对经济学的了解，且能以对经济学文献所作之努力与贡献，而使其他经济学者受益良多。获奖消息，使得“李登辉”的名字出现在台湾各大报刊上，人们才知道了“李登辉”。李登辉回台后继续在台湾大学任教并任职于“农复会”。1971年，他以“农复会专家”身份向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汇报岛内农业问题。次年6月他在新西兰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突然接到“入阁”出任“政务委员”的消息。

直至1978年，已出任“台北市市长”的李登辉辞去台湾大学教学职务。台湾大学农经教学研究部门，一直是李登辉的主要学术、教学场所。他在长达30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约写了百余篇论文，曾于1983年间分3集共2800页出版。代表作有《台湾农业发展对经济成长之贡献》、《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形态》等。

关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就经济学理论来论，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对台湾地区农业、工业经济之间关系的论述，基本是符合岛内经济状况的，也能对岛内农工转型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他的研究成果，能否对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有指导意义则很

难说。就李登辉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搞学问显然要比做其他事情尤其是玩政治要好得多。

关于李登辉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事，确有其事。在台湾大学经济系学习时，面对国民党接收台湾时的腐败和贪婪，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台工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台湾大学学生读书会，不久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成员。入党介绍人为吴克泰，吴不久返回大陆。由于李登辉当时根本没有为党和人民利益献出一切的决心，也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由于他对党组织从事的农民运动不满，没过多久，就正式要求退党。党组织派许懋德出面，与李登辉谈定，同意退党，双方都要保守秘密，党组织不暴露李登辉入党一事，李登辉也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后来在 1950 年 2 月间，“台工委”组织被国民党当局破坏，“读书会”中不少人遇害，此事是否由于李登辉告密的结果，台湾当局没有公布过。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在李登辉 1951 年间赴美进修时，被当局有关部门查出，但因他本人确实早已退党，又经“有力人士”担保，才得以成行。李登辉入党退党经过，在 1972 年 6 月被蒋经国吸收“入阁”时，向蒋经国作了说明。

早期的李登辉，无论是家庭还是本人，并未有什么过人之处，后来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具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属于官场上常有的偶然性在起作用。但是作为早期的李登辉，已经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一是对共产党的仇视。在大学期间加入和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说明他对共产主义并无感情，更无信念，这对他后来政治上决策有着很深的影响，反共成为他一生的信念。二是对“一个中国”缺乏认同。李登辉在求学过程中受到日本文化的熏染，日本强占台湾后推行的“皇民意识”和文化风俗。使

得他直到以后一直认为自己曾是“日本籍”，把接收、管理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外来政权”。三是“戒急用忍”。青年时期的李登辉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研究方面，外表木讷，少言寡语，故旁人很难发现他的本来面目。四是“个人奋斗欲”过分强烈。这样必然导致一旦大权在握，在强烈的“功自我成”的功利心理驱使下，走向极端之路。

1972年6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开始重用台籍人士，李登辉也因此出任“政务委员”。他与“农复会”一起负责农业问题。

此时，台湾农业已进入瓶颈时期。台湾农业曾经为工业经济的发展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原料，为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在农业经济的支持下，工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农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局限性，劳动力、土地、产量等都处于极限，利用农业的积累帮助工业发展现已到了“功成身退”的地步，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实力和资金，应该投入农业，帮助农业完成现代化。振兴农业，是从1969年5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1972年6月出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的愿望。他的施政重点就是“农工兼蓄”，发展工业不能牺牲农业，更不能因为都市的发展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致使农业出现衰退。

李登辉研究的正是这个课题，在长达2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利用在“农林厅”、“农复会”和“合作金库”兼职的机会，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再根据所掌握的经济理论，就台湾地区的农工关系问题，进行长期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他认为，台湾农业正在重复大多数发达地区所走过的老路：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工业化完成初期因偏重工业而轻视

农业，造成农业停滞不前；上业化进入更高层次后应以其经济实力和支援农业，农业开始现代化。他认定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和农工关系正处于“工业化起步，农业停滞”的第二阶段。这符合蒋经国的看法和施政重点。

自从美国获奖回来后不久，一直忙于岛内外学术交流的李登辉，在官场和同行、知识界和媒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步跨入“行政院”时年只有 49 岁。李登辉在任内，根据业务专长，确实提出过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提高农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对农民的信贷，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基金等。当时，蒋经国提出的农业政策，扭转农业滑坡采取的种种措施，大部分出自于“李委员”处。李登辉的理论确有符合台湾现状之处，但也是台湾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才使得李登辉所主张的“工业补偿农业”有了实现的经济基础；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李登辉即便拿出“工业补偿农业”方案，恐怕也是徒劳的。

1978 年 6 月，已经出任“政务委员” 6 年的李登辉，同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调任既有权又敏感的“台北市长”。这是 1 个月前出任第七届“总统”的蒋经国签署的第一张委任状，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李的信任。当新的任命公布后，“新市长”立志从政，辞去了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的“教授”和“农复会顾问”职务。这位长期从事农业问题研究和主导农业经济的李登辉，开始主持城市行政。1981 年 10 月，李登辉又接到新的任命，出任“台湾省主席”。他在任内，并无过多的政绩，但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比如市政建设、筹设 8 万农业大军、“十三项省政建设计划”等等，有多少经济效益且不论，但取得相当大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蒋经国对此是肯定再三，舆论界更是大惊

小怪，似乎李登辉解决了台湾的社会和经济的难题。

李登辉数年间连续出任要职，政治行情一再上涨，这事实上也是某种暗示，他将在政治上获得更大的权力。当然，在习惯于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官场，特别是众多文臣武将的年龄大都是中年尾、老年初的情况下，李登辉出任蒋经国副手的局势还不明朗，也不易为外人所看出。

## 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1984年2月16日，国民党举行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国民党第七届“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会议的主要内容。“副总统”一职，在国民党历史有着三种情况：

一是“空头副总统”。如以前出任此职的多数人一样，位高权轻，无所作为，只是“总统”的“伴郎”而已，蒋介石时期的李宗仁和严家淦，以及蒋经国的第一个“副总统”谢东闵就是如此。甚至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无权调动中央财政和军事物资；严家淦、谢东闵更是甘当“无名英雄”的人，从不抛头露面，与蒋争荣。他们参与决策但不作任何决策；身为“副总统”但谁也指挥不了，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也不听“总统伴郎”的指挥。

二是“强势副总统”。陈诚在非常时期出任“副总统”，他在台湾共15年，先后出任“行政院长”9年、“副总裁”8年、“副总统”11年，其中在1957年7月至1963年12月间，一身兼任以上三职，成为实力派总头目。在当时蒋介石高高在上的情况下，陈诚与蒋经国一起，实际主导政局的运作，协助蒋介石完成了国民党逃台初期的整顿和社会的治理，主持了国民党主政台湾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工作。在国民党官场激烈的斗争中，

一生保住权力不说，直到死时也是荣耀无比。

三是“接班副总统”。根据国民党的“宪法”第 49 条的规定，在“总统”不能视事时，由在职的“副总统”接任。前有李宗仁，在 1949 年 1 月 20 日蒋介石宣布辞职时，自然由李出任“代总统”；再有严家淦，在 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去世时，自然由严继任“总统”，即使此时已是“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也不敢僭越，严家淦本人也无当“总统”、控制国民党、压制蒋经国的意思，只得按照“宪法”规定，蒋经国礼让严家淦，严家淦也同意继任。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陈诚的官运是因为政治背景特殊，无可比性。因此，大部分“副总统”只能是第一种情况，要想实现第三种情况，则要取决于“政治强人”型“总统”的健康状况。只要“强势总统”健在，那么“副总统”只能是“花瓶型”。国民党第七任“副总统”的前景则因为蒋经国的健康状况的不稳定性，也出现了“空头”和“接班”的两种可能。如果蒋经国无法度过新的 6 年任期，那么“副总统”显然则成为“接班者”；如果蒋经国顺利完成以后的 6 年任期，那么“副总统”只能是“陪衬”。对自己健康状态估计过分乐观的蒋经国和他身边的智囊们，在选择“副总统”和“接班”问题上也就缺少长远的考虑。而这种选择又因为蒋经国过 3 年余突然去世，“副总统”又具备了第三种情况的性质。

郝柏村是这样回忆的：“经国先生打算让本省人做副总统，行政院长还是由孙运璿做。经国先生的意思是孙运璿再做 6 年行政院长；他很有信心，总统他先做两任（已做完一任），他不做了，让孙运璿做总统。但是没有想到孙运璿病倒，整个布局就乱了。（王力行：《无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39 页）

就蒋经国从挑选“接班者”的角度论，不可能挑选李登辉。李登辉从政 12 年，虽说担负过不少政务，也主持过台湾地区最为敏感的台北市和管辖范围最大的台湾省，但没有处理过任何社会突发事件，没有经历过党内重大的政治斗争，也没有遭受过挫折的考验，也就是说因为当时的李登辉并没有显示出解决当时党内和社会各类矛盾的能力，蒋经国不会把身后的国民党和台湾地区交给当时还看不出有多大权威和从政能力的李登辉。否则，则是蒋经国不负责任。李登辉既不要“生气”蒋经国不是从挑选“接班者”的高度来选择了他，也不要“庆幸”自己不是蒋经国挑选的“接班者”，所以也不要为背叛蒋经国而感到歉意，更不要以此作为与“蒋家独裁”划清界限的理由。因为，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蒋经国考虑此类问题和作出如此决定并不意外。如果李登辉还“生气”的话，那么再次被蒋经国冷落的，资历和政绩远超过李登辉的孙运璿等国民党重臣又如何平衡心理呢？

因此，蒋经国挑选的“副总统”，至多只是从培养和观察的角度来决定人选的，远不是从考虑“交接班”的高度认识的。正是基于选“副总统”不是接班而是培养和考察，蒋经国所以选择了李登辉。当然，挑选副手时是一回事，到蒋经国去世时则是另一回事。不管蒋经国在提名李登辉出任“副总统”时是如何考虑的，但是当蒋经国病故时，李登辉则成了事实上的“接班者”。蒋经国在最后的岁月和“政治交代”中没有提及让李登辉“接班”，但在知道“宪法”第 49 条规定的情况下，没有否定李登辉的“接班”资格，事实上也是等于同意让李登辉“接班”。特别是蒋经国并没有对身后事特别是权力交替，发表专门意见，事实上是默认了李登辉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李登辉继蒋经国出掌最高权力，既有“宪法”条款保驾，也有蒋经国的默认。所以尽管

在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上层围绕谁主政问题，屡次出现激烈政争，但李登辉还是四两拨千斤，一次又一次得逞，亲蒋派一次又一次败北。因此，李登辉接替蒋经国，并不是像李登辉同司马辽太郎所说的那样：“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让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正如“食客添第三碗饭时是悄悄地要人盛饭”才得以“接班”！李登辉在 1999 年 5 月 19 日出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则改变了“对谈”中的提法，用了专门篇幅，把蒋经国的领导比作“蒋经国学校”，自己在蒋经国手下工作是在“蒋经国学校中学习”，倒也不缺虔诚的样子。

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当进行提名“副总统”议程时，蒋经国缓缓地念出“李登辉”三个字时，全场经过短暂的沉默后，响起了掌声表示赞同，李登辉成了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1984 年 3 月 23 日，“国民大会”正式选举李登辉为“副总统”，台湾政坛出现又一匹“黑马”，这预示着台湾政局的发展将有着不可捉摸的将来。

至此，李登辉在岛内政坛和国民党内已有着不可阻挡的前途。他作为一个学者，未参加过台湾极其普遍的任何基层选举，青云直上，超越多少国民党元老重臣，超越多少台籍政治代表人物，超越多少官场红人，12 年间成为当局的“副总统”，3 年余后接替蒋经国出台主政，他之所以“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李登辉的韬略。李登辉自觉从事政治活动为时短暂，资历浅薄，政绩不厚。从政时间短，所以也缺少相应的人脉关系。资历浅薄和缺少人脉关系，也就谈不上有实力。和蒋经国的关系，固然成为李登辉惟一的依托，但因成为蒋经国宠臣的时间稍短，双方关系谈不上深厚和扎实，再说蒋经国在用人上捉摸不

定，被他冷冻和抛弃的追随者不计其数，很难确保两者关系牢不可破。面对这一不利自己的政治态势，李登辉进入官场后选择的行动策略有二：

隐起锋芒。李登辉深知作为“官场新人”，已经引起上级下级友人仇人的分外关注，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放肆和不检点，再增加他人进攻自己的材料。只能“到位”而不能“越位”，只能藏起自己的任何欲望。因此，他自出任“政务委员”起，直至登上“省主席”和“副总统”宝座，无论在公开场合或是内部官场，无论是晋见上级或是会见下级时，总是七分带笑，三分见善，凡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含威不露，藏起锋芒。李登辉的伪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原有的固执、好斗、自大、无情的本性，得到很好的掩护和伪装。可以说在蒋经国活着的时候，李登辉给舆论界和官民留下的全是“平和、谦恭”的一面。

避短扬长。李登辉深知自己的劣势是为官经验不足，他的优势是学术水平较高，但这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在知识有价的社会里也会尊重有学问的人。李登辉的学者身份，成为有利于他发挥和运作的条件，他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总是从理论和学术的高度，结合岛内的实际，进行充分而广泛的论述。既给蒋经国和其他主管官员予全面而可行的感觉，也留下李登辉远比行政官员高出一筹的印象。不管计划有何效益，但计划蓝图新鲜，富有前瞻眼光和广阔视野，博得上下左右的欢迎。李登辉用学术上的“长”来弥补暂时的从政上的“短”，可以说是棋高一着，收效甚大。

二是蒋经国的信任。在蒋经国后期的台湾政治运作中，要想在官场上站住脚，必须长期得到蒋经国的支持和肯定，李登辉政治发迹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蒋经国对李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越级提拔。李登辉的升迁，是由蒋越级超速提拔造成的。在台籍代表人士中，谢东闵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历经十年；林洋港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台北市长”历经 21 年；徐庆钟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内政部长”历经 16 年；林金生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历经 24 年；吴伯雄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中央委员历经 14 年；邱创焕自参加国民党的工作至出任中央党部社工部主任历经 14 年……李登辉则不一样，起步就是“入阁为官”，升至“副总统”只有 12 年。蒋经国确是有意识地重用李登辉，一再授予大权。

授予重权。李登辉任“政务委员”时，蒋经国就经常把“国防”预算、农业发展策略、经济调整等一些难题交给李登辉处理。1981 年 10 月，任命李登辉出任“省主席”，这对于一个从政 8 年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特殊使用。自台湾光复后，出任过“省主席”的人分别是：陈仪、魏道明、陈诚、吴国桢、俞鸿钧、严家淦、周至柔、黄杰、陈大庆、谢东闵、林洋港，前 9 人都为国民党大老重臣，谢东闵、林洋港既是国民党要员，也是台籍菁英代表：谢东闵已任过“高雄县长”、“省议会议长”、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中常委”）等多项重要职务；林洋港已任过“南投县长”、“省建设厅长”、“台北市长”等职，而李登辉却是“政坛新兵”，他并非是靠政绩和资历获选，完全是由蒋经国一手安排所致。

选为“副手”。蒋经国退台后，视为亲信的人不少，既有上下级关系又是朋友关系的人也不少，可是他权重疑心重，反复无常，尤其到晚年更是多疑，被他冷落和发落的人越来越多，而李

登辉则不一样，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和依靠力量。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推动“政治改革”时，一再遭到抵制，因而对元老和旧官僚更加失望，这样就更加信任李登辉，李登辉成为他决策时的主要智囊。在选择“副手”时，李登辉超越谢东闵、孙运璿、俞国华、李焕等多人入选。不管是出于培养、考察，还是为了“交班”、“接班”，蒋经国选择李登辉出任“副总统”是信任的结果。

三是李登辉的“务实”。事实上，李登辉 12 年间以及在“副总统”任内，并无有什么独创性的见解和重大政绩，至多只是在行事方式上有不同。他的成功之处是既能抓住蒋经国的心理，又能抓住社会媒体的心理，使自己施政措施的影响远大于施政效益。在关于提高岛内农业生产层次方面，他对蒋经国和其他要员更多的是论述施政方针的意义和依据，对社会和民众更多的是宣传计划的进度和效益；在关于蒋经国后期的政治改革上，他对蒋经国则表明坚定支持的态度，鼓动蒋经国继续改革，对保守派则不表示意见，以免成为批判的目标。在为官作风上，如岛内一些社会媒体所说，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平易近人，了解民情”、“专业基础扎实 理论功底雄厚”、“和市民一样排队献血”、“儿子、女儿结婚不声张”，这些与旧式官员不同的做法和作风，给他在社会上带来不少“赞扬声”，蒋经国更是认为自己选出了一位空前绝后的“好官员”。应该说 90 年代以前的李登辉，还是比较“务实”的。他的“务实”，是他的政治韬略一部分，也是其实现韬略的主要手法。

## 国民党主席病故和李登辉出台

正是因为李登辉有他的特殊之处，所以在国民党内发展顺利，进展神速，成为蒋经国最为信赖的副手和决策层的中心人

物，在党内的地位不断提升和强化。

在 1984 年 2 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李登辉在中常会内部排名第九位，前面分别是前“总统”严家淦、前“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璿、“宪政研讨会副主任委员”谷正纲、“总统府资政”黄少谷、“立法院长”倪文亚、“国策顾问”袁守谦、“战略顾问”高魁元。因为李登辉在此次全会上，经蒋经国提名为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再加上蒋经国的信任，所以在党内的实际地位远高于第九位。

在 1986 年 3 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李登辉在中常会内的排名上升为第三，仅次于前“总统”严家淦和前“副总统”谢东闵。1987 年初，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好，中常会先由严家淦（不久病倒）后由谢东闵主持。3 月 25 日起李登辉由蒋经国亲自安排，主持每周一次的例行中常会，同时他在中常会内的排名也由第三名移为第一名，改变了作为“官职上是老二”的李登辉在党内与“副总统”地位不相一致的局面，党政两方面均名列蒋经国之后。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为推动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革新，决定由“总统府资政”谢东闵、谷正纲、黄少谷，“行政院长”俞国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林洋港，“总统府国策顾问”袁守谦，“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内政部长”吴伯雄，“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等 12 名中常委，组成“政治革新小组”，讨论结束“戒严”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革新小组分为两组，严家淦为第一分组负责人，黄少谷为第二分组负责人。不久严家淦中风病倒，从 1987 年 3 月起，随着李登辉成为“实际第一中常委”，革新小组也归李登辉负责。这样，他成为中常会的实际主持者。

李登辉在政坛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体现在职务的不断上升，更重要是他在国民党内决策时的发言权越来越大。蒋经国决心进行自 80 年代开始一再受阻的全面革新，李登辉不仅是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并在结束“戒严”、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减弱对政治反对派的压力等当时岛内最为敏感的问题上，利用能够经常见到蒋经国的机会，提出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在绝大部分国民党元老重臣和中常委见不到处于病重阶段的蒋经国情况下，李登辉有着晋见蒋经国的畅通渠道，能够传递蒋经国的“面谕”和“指示”，无疑在同僚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自 1972 年至 1988 年初，李登辉在官场上磨练约 16 年，为最后接替蒋经国准备了他人无法相比的基础。与国民党元老重臣相比，李登辉有着年龄和开明的优势；与青年才俊相比，李登辉有着专业强的优势；与台籍其他菁英相比，李登辉有着更被蒋经国信任的优势。不少元老重臣不会排斥李登辉，作为亲蒋势力的老人们，因为忠诚于蒋经国，爱屋及乌，当然对蒋经国选择的“接班者”也会接纳；青年才俊们不会拒绝李登辉，他们同李登辉的从政资历差不多或者是稍高于，他们大都是“革新派”，当然不会为难主张和主持政治革新的李登辉；台籍人士在政坛上已形成不小的政治势力，其中也有一些人并不服气李登辉作为台籍势力的“领袖”，但为了保住和扩大台籍势力的影响，当然也不会表示对李登辉的不满。因此，台湾政治生态的现实，已经造成必由李登辉“接班”之势。

就像李登辉出乎意料地被蒋经国邀请“入阁”和先后任命为“台北市长”、“台湾省长”一样，又出乎意料地取代蒋经国而成为“总统”。

1988 年 1 月 13 日 15 时 50 分，蒋经国突然去世。主治大夫